



**University of
Zurich**^{UZH}

**Zurich Open Repository and
Archive**

University of Zurich
University Library
Strickhofstrasse 39
CH-8057 Zurich
www.zora.uzh.ch

Year: 2017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A Practice Theory Perspective

Chen, Chunhua ; Ma, Shenghui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502.2017.11.012>

Posted at the Zurich Open Repository and Archive, University of Zurich

ZORA URL: <https://doi.org/10.5167/uzh-173870>

Journal Article

Originally published at:

Chen, Chunhua; Ma, Shenghui (2017).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A Practice Theory Perspective. Management World:158-169.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502.2017.11.012>

See discussions, stats, and author profiles for this publication at: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2551410>

中国管理研究——实践理论视角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A Practice Theory Perspective)

Article in *Management world* · November 2017

DOI: 10.3969/j.issn.1002-5502.2017.11.012

CITATIONS

0

READS

188

2 authors, including:



Shenghui Ma

University of Zurich

8 PUBLICATIONS 14 CITATIONS

SEE PROFILE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路径探索：基于实践理论的视角

陈春花（北京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马胜辉（苏黎世大学）

摘 要 在经历了 30 多年的发展并从西方引入大量的管理理论之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应该如何进一步发展成为学界探讨和争论的热点。回应学界最近的讨论，本文认为，以研究本土管理实践为重心的中国管理研究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针对学界在实现路径上的疑惑并推动对本土管理实践的深入研究，本文介绍了实践理论（practice theory）的视角及其对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重要启示。透过这一视角，本文构建了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研究的实现路径，探讨了中国管理实践的特殊性及亟需研究的相关问题，并对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研究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指导价值进行了展望和探讨。

关键词 本土管理研究，中国管理实践，实践理论，实践视角，研究路径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A Practice Theory Perspective

Chunhua Chen (Peking University;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henghui Ma (University of Zurich)

Abstract After introducing many Western theories in the last three decades,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has arrived at a point where scholars have become greatly concerned with its future direction. In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debates, we argue that closely examining the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Chinese firms can provide an opportunity to develop new theories and generate insights that are relevant to Chinese practitioners. In order to stimulate this line of inquiry, we introduce a practice theory perspective and discuss its implications on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From this perspective, we develop a practice-based framework for studying Chinese management practices by discussing how practices can be defined and analyzed. To identify important research areas, we discuss why Chinese management practices may differ from Western ones and discuss the relevant qu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Finally, we discuss the potential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of studying Chinese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the practical relevance of such studies.

Keywords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Chinese management practices; Practice theory; Practice perspective; Future directions

一、引言

自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管理学在中国经历了 30 多年的发展并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上取得了巨大进步（郭重庆，2008；张静等，2016）。在大量引进西方的管理理论和研究方法之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进入了一个学科发展的历史转折点。近些年，特别针对本土研究与管理实践严重脱节的现象，学界对于管理学研究应该如何定位和进一步发展进行了广泛的反思和争论。例如，《管理学报》自 2005 年开始主办“中国·实践·管理”系列年度论坛，持续倡导学者对本土实践进行深入研究。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也将 2014 年的双年会主题定为“立足中国实践，创新管理理论”，鼓励学者研究中国企业特有的重要问题并探索中国情景下的管理新概念和新理论。重要的管理期刊，如《管理世界》、《管理学报》、《组织管理研究》（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等，近年来都对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未来和出路进行了专题探讨。在这场大讨论中，众多学者积极参与并对如何加强对中国特定情境下的管理实践进行研究甚至构建中国的管理理论提出了不同构想（如：Barney and Zhang, 2009；曹祖毅等，2015；陈春花，2011；陈春花，2016；陈春花等，2014；郭重庆，2008；韩巍，2011；黄光国等，2014；蓝海林等，2012；刘祯等，2014；齐善鸿等，2010；谭力文等，2015；Tsui, 2006；Tsui, 2009；席酉明和韩巍，2010；徐淑英和吕力，2015；张静等，2016；章凯等，2014）。

回顾学界的讨论，我们发现关注中国本土的管理实践，构建能够有效解释和指导本土实践的理论已经成为学者们的共识。然而，真正践行这一理念的实际研究仍然非常有限，呈现出讨论激烈而行动不足的局面（曹祖毅等，2015；韩巍，2011；刘祯，2014）。究其原因，没有在实际路径上达成清晰一致的看法是关键所在。首先，在研究对象上，学者们虽然一直号召深入研究本土的管理实践，但却没有对“管理实践”进行明确的定义，没有对构成管理实践的基本要素进行探讨，导致了实际操作中不知如何有效地界定研究对象和分析角度（曹祖毅等，2015）。其次，对基于实践的研究如何进行理论体系构建和贡献管理理论，学界还存在彷徨。章凯等（2014）总结了学界关于本土研究在理论构建上的三种不同的观点：中国管理理论、管理的中国理论、以及普适性理论（Barney and Zhang, 2009；陈春花等，2014；Leung, 2009；Tsui, 2009）。因为这些不同观点，学者们似乎对于本土实践研究如何能够真正贡献管理理论仍然存疑。再次，学界对中国管理实践的特殊性探讨不足。不明确本土管理实践为何不同于其他国家，学者们在具体研究中将难以聚焦于那些独特的本土管理实践。正因为未能明确以上在实际路径上的各种疑惑，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研究依然止步不前。

为解决在实现路径上的疑惑并真正推动对中国管理实践的研究，本文将介绍实践理论（practice theory）的视角及其对本土研究的启示。由于近几十年在社会科学中的兴起（Schatzki *et al.*, 2001），实践理论被日益广泛地应用于组织和管理研究的诸多领域，如战略管理、领导、知识管理、组织常规（routines）、技术应用、制度化（institutionalism）等等（Feldman and Orlikowski, 2011）。虽然不同流派的实践理论对“实践”内涵的理解略有不同，“实践”可以被界定为具有特定模式的一系列有组织的活动的集合（Feldman and Orlikowski, 2011; Reckwitz, 2002; Whittington, 2006）。这一系列活动组合起来的特定模式通常是为达到一个具体目标，并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成员所共享。实践理论的视角认为，要理解一个社会现象，必须要研究构成这个社会现象的一系列实际活动（Feldman and Orlikowski, 2011; Whittington, 2006）。例如，应用于战略管理研究当中，实践理论的视角引导了学者们去研究战略实践，即管理者在日常工作中到底如何开展与战略相关的活动（the “doing” of strategy actors），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于战略管理的复杂性的理解，包括战略决策的微观过程，战略工具和方法的运用，战略变革的过程，不同层次战略管理者的角色，等等（Golsorkhi *et al.*, 2010; Jarzabkowski, 2003; Johnson *et al.*, 2007; Vaara and Whittington, 2012; Whittington, 2006）。实践理论为研究管理实践提供了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哲学基础。因为实践理论的视角完全切合重视本土管理实践这一理念，并推动了组织与管理诸多领域对于实践的深入研究，我们认为有必要介绍这一理论视角并系统地探讨其对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启示，从而探索一条研究本土实践的系统性的路径。

为此，本文的其他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实践理论视角及其在国外管理研究中的应用；第三部分试图构建一个基于实践理论视角的研究路径，包括界定“管理实践”的定义及其构成要素，从而为界定研究对象，框定关键问题和分析角度，以及构建理论提供了基础。同时，我们探讨了如何有效地利用定性和定量方法来研究管理实践。第四部分探讨了中国管理实践的特殊性，并讨论了与其相关的亟需研究的重要问题。第五部分讨论了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研究的理论贡献，表现在构建理解本土实践的理论体系和对全球管理知识的贡献两个方面。第六部分深入讨论了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研究如何能够对本土实践提供现实指导价值。第七部分总结了本文的主要观点。

二、介绍实践理论视角及其在管理研究中的应用

实践理论（practice theory）在现代社会科学的兴起源于一系列倡导实践在构建社会现实（social reality）中扮演核心角色的学术思潮。这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哲学家（如 Wittgenstein, 1953; Foucault, 1977）、社会学家（如 Giddens, 1984; Bourdieu, 1990）、活动理论学家（如 Vygotsky, 1978）、人类学家（如 Ortner, 2006），等等（Golsorkhi *et al.*, 2015; Nicolini, 2012）。因此，实践理论并非一个高度统一的社会理论体系，而是由不同学派所组成（关于这些不同学派的不同，可参见 Nicolini, 2012）。因为实践理论在国内管理学研究中少有讨论，我们认为有必要介绍这些学派对于理解社会现象所共享的一些核心观点，从而形成对实践理论视角的基本认识。然后，以战略管理为例，讨论这一视角在管理研究中所催生的新的研究方向和理论成果，从而为探讨其对中国本土研究的启发意义提供基础。

（一）实践理论的一些核心观点

虽然实践理论的不同学派在具体观点上有所差异，但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它们共享一些基本的理论逻辑，都认为研究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是理解社会现象的关键所在（Feldman and Orlikowski, 2011; Golsorkhi *et al.*, 2015）。首先，实践理论认为日常活动（activity）及其构成的实践对社会现实的构建和重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不同于主张个体的活动和行为主要是由社会结构所统摄的观点。根据实践理论的观点，社会现实的存续并非固化在种种的社会结构（如社会层级，规范和制度，角色等）当中，而是呈现在相续的社会个体的活动和实践之中。个体的活动既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也同时不断地构建和重塑社会结构（Giddens, 1984）。因此，实践理论提供了理解社会现实在微观层面的基础。这意味着要理解特定的社会现象，学者们需要注重对微观层面的具体活动及其构成的实践进行研究，而非单纯的依靠对这些活动的抽象描述。例如，要充分理解一个组织的运作模式，就需要去观察组织成员日常的工作活动和互动以及组织成员与外部人员的互动，而不是单纯的依靠组织结构图、组织章程或岗位描述。对于管理研究，实践理论的重要启示是通过研究个体所参与的活动及其构成的实践，学者可以为解释宏观的组织现象提供微观基础。

其次，实践理论强调个体的具体活动的开展（或个体的实践）是受到个体所在场域（field）中广泛盛行的实践所影响的（Bourdieu, 1990; Jarzabkowski *et al.*, 2016）。由于种种原因，一个场域当中通常存在着大家所共享和盛行的实践，如工厂管理的做法、公司治理的方式、团队协作的模式、领导下属的方式，等等。场域中的成员在开展具体活动的时候，通常受到这些盛行实践的影响。例如，一个企业在开展公司治理中通常会采用所在行业和所在国家在治理中的普遍做法。这些盛行的实践和做法一方面提供场域成员开展具体活动的模板，另一方面也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场域成员采用完全不同的做法。从这个意义上讲，场域的成员是社会性地嵌入在场域之中（Bourdieu, 1990）。因此，实践理论倡导在研究中不仅仅要关注个体活动或个体的实践，还需要考察其与场域中盛行的实践之间的关系，考察个体的活动的开展是如何遵从和偏离盛行的实践的。

再次，实践理论突出了个体的能动性（agency）。个体是实践及其相关活动的承载者和实施者（Reckwitz, 2002）。在开展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因为需要适应具体的情境，个体总是需要对既定的实践模式进行某种程度上的调整而非简单地完全重复。例如，员工招聘存在着一些行业通行的实践模式，然而在一个企业的具体操作中，招聘人员可能因为要满足企业快速增长的特别需求，而采用新的招聘途径和评估标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因为每一个情境都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每一次对既定实践模式的运用都是存在某种程度的即兴发挥。这是实践不断改变和演进的重要源泉之一。同时，特别是在组织中，一个实践的开展通常涉及多个个体（如团队协作）。每个个体在实践中均具有能动性，而并非只有占据主导地位个体。实践理论强调对不同个体能动性的关注，包括他们如何参与和开展实践活动，以及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实践理论在逻辑上给个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提供了理论空间。对于组织与管理研究，这种视角倡导学者们去关注个体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从而构建相关理论去解释管理实践如何在应用中不断变异、进化和创新。

最后，实践理论强调实践与情境的共同进化（coevolution）。一个实践的情境不仅仅包括物质和文化因素，更包括它所发生的环境中其他的实践（Nicolini, 2012）。在实践理论看来，没有任何社会现象是孤立存在的；任何社会现象的存在都是建立在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之上。实践与其所存在的情境的关系也是如此。实践的产生和变化不仅仅受到情境的影响，实践也影响着情境的变化。因此，情境不再只是一个相对静态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与实践共同进化的。例如，基于手机网络平台的打车模式是在传统的出租车行业背景下产生，但这种商业实践的发展也改变了传统出租车行业的运行模式。从这个角度来看，要深入理解一个实践的发展，需要关注它与其所在的情境之间的共同影响、共同进化的关系。单单孤立地研究单个具体的实践，或者把情境或与其关联的其它实践当做一个静态的因素，将很难全面地捕捉实践的产生，形成和演化机理。

基于以上这些核心观点，实践理论的不同学派为在社会科学领域开展实践研究提供了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基础。这股思潮影响了社会科学中诸多学科的发展，其中包括管理学。以下将以战略管理为例，介绍实践理论视角对管理学研究的影响。

（二）实践理论视角在管理研究中的应用——以战略管理为例

正如引言中所提到，实践理论视角已经被应用到组织和管理研究的诸多领域，促进了在战略管理、知识管理、技术应用、制度化等领域对相关实践的深入研究（Feldman and Orlikowski, 2011）。我们将以战略管理为例，讨论实践理论视角对相关研究的影响，从而阐明这一视角对中国管理实践研究的借鉴意义。在过去的 10 多年间，“战略作为实践”（strategy-as-practice，以下简称 SAP）的一系列研究成为战略管理领域一股强劲的新思潮，并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国际研究社群，在美国管理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和美国战略管理学会（Strategic Management Society）分别成立了专门的分部。基于实践理论的视角，SAP 注重研究人们是如何在实际中具体参与战略相关的活动（the doing of strategy），同时突出了战略参与人员的能动性。这不同于主流战略管理学派在微观经济学逻辑影响下的研究重点——组织拥有什么样的战略以及相应的绩效表现（Vaara and Whittington, 2012; Golsorkhi *et al.*, 2015）。

在研究主题上，SAP 的研究突破了当时战略研究的范畴，研究了战略实践当中一系列重要的问题。Whittington（2006）倡导了一个 SAP 的总体框架来研究战略实践，包括三个部分：实践者（practitioners），即实际参与战略的形成、制定、执行的人员；具体活动（praxis），即具体情境下的跟战略相关的活动；实践（practices），即以具体活动为基础所形成的惯例性的活动模式。在具体的研究中，学者们研究了高层管理者、中层管理者、董事会成员、以及其他人员在战略决策及执行过程中的具体活动和角色（如 Balogun and Johnson, 2004; Jarzabkowski, 2008; Ma and Seidl, forthcoming; Maitlis, 2004）。例如，Balogun and Johnson（2004）研究了中层管理者在执行战略变革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他们在观念结构上的变化过程，以及他们如何通过同一层级之间的互动去影响战略变革的实施。学者们还对战略决策（如 Kaplan and Orlikowski, 2013; Liu and Maitlis, 2014）和战略变革（如 Denis *et al.*, 2001; Mantere *et al.*, 2012; Huy *et al.*, 2014）的微观过程进行了研究，丰富了学界对于战略管理微观基础的理解。另外，学者们还研究了一些具体的实践活动如何开展并影响战略发展，包括战略会议、战略研讨、语汇运用、意义塑造，等等（如 Hendry and Seidl, 2003; Kaplan, 2008; Jarzabkowski and Seidl, 2008; Paroutis and Heracleous, 2013）。

在研究方法上，不同于主流战略研究所采用的定量统计方法，SAP 的研究大量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为了探寻战略实践和活动中的动态和机制，这些研究通常采用现场观察、深度访谈、或者收集内部材料作为一手研究资料。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案例研究或扎根理论的分析方法去构建理论，而不是检验已有的理论（Eisenhardt, 1989a）。虽然到目前为止 SAP 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这并不排除定量研究仍然可以用来研究战略实践，关键在于研究问题的框定。

例如，在研究特定实践应用的普遍性或企业运用特定的实践是否能够产生优于其他企业的绩效时，定量研究方法有其优势所在（Bloom and Van Reenen, 2010; Bromiley and Rau, 2014; Laamanen *et al.*, 2015）。

在研究成果的积累上，SAP 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截至 2015 年，超过 100 篇的相关论文发表在顶级的学术期刊上（Golsorkhi *et al.*, 2015），并有两篇全面的文献综述去梳理这些研究的进展和理论贡献（Jarzabkowski and Spee, 2009; Varra and Whittington, 2012）。虽然这些研究能否形成一个系统性的理论体系仍然有待商榷，这些研究的确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学界对战略管理的理解（Langley, 2015）。Varra and Whittington (2012, p.14) 在回顾当时的 SAP 文献时说，“SAP 的系列研究已经拓展了主流的战略研究，这是通过聚焦在过去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实践以及发掘这些实践中我们以前从未想象到的作用机理”。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学界对于战略实践的动态性和复杂性的深入理解，也有助于修正现有理论的基本假设并为未来的理论构建和发展提供基础。

三、构建基于实践理论视角的研究路径

通过以上对实践理论视角及其对战略研究影响的介绍，可以看出这一视角对于研究中国本土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尤其重要的是，这一视角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为研究管理实践提供了基础。本部分将基于实践理论视角，试图构建一个研究中国本土管理实践的路径，包括如何定义管理实践，框定问题和分析角度的切入点，理论构建的导向，和研究方法的建议。

（一）界定对象：定义管理实践

明确管理实践的定义是我们在研究本土实践中能够界定研究对象的前提。基于实践理论的视角，管理实践的定义可以界定如下：一个管理实践是指为达到特定的组织目标，具有特定模式的一系列有组织的活动的集合（Feldman and Orlikowski, 2011; Reckwitz, 2002; Whittington, 2006）。特定模式是指构成一个实践的系列活动之间存在着相关联的逻辑关系，从而使这些活动表现出特定的组合样式。根据其目标和所涉及的活动范围，管理实践可以界定在不同层面。例如，企业的战略规划相对于团队决策，前者的目标通常更为宏观，所涉及的活动和人员范围也更广，因此是更为宏观层面的管理实践；前者可以看作是组织层面的管理实践，而后者可以看作是团体层面的。根据相同的逻辑，组织间的战略联盟相对于企业内部的战略规划，则是更

宏观的管理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讲，宏观层面的管理实践也可以看作是由较微观层面的不同实践所构成的（Schatzki, 2006）。因此，管理实践是宏观还是微观，抑或是界定在个体、团队或组织层面还是更宏观的层面，在于该实践所要达到的组织目标及其涉及活动的范围。在具体研究中，界定管理实践的层面，需要取决于研究者所感兴趣的研究问题（曹祖毅等，2015）。

除了在现象层面上的不同，管理实践还存在着共享程度上的区别。在空间维度上，有一些管理实践在行业或区域内盛为流行，为较多企业所共享，而有一些则较有少见。在时间维度上，有一些管理实践会不断重复，而有一些管理实践则处于尝试的阶段。关注不同管理实践在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上共享性上的区别，有利于我们深入研究不同管理实践在发展上所处的不同阶段，从而探讨其进化的机制。同时，这也有利于我们探讨管理实践在不同区域的差异和相互影响。例如，在中国不同省份内部的企业可能有高度共享的管理实践，而在省份之间管理实践的差异则可能比较大。

以上讨论了如何定义管理实践以及不同管理实践存在的差异，目的在于帮助学者在具体研究中界定研究对象。以下，我们将针对在具体研究中如何框定问题和选择合适的分析角度，提供一个理论框架。

（二）框定问题和分析角度：以管理实践三元素为基础的理论框架

基于上面对管理实践定义的探讨，对中国本土管理实践的研究就意味着要发掘特定管理实践所包含的一系列活动，以及将这些活动如何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从而达到特定目标的内在逻辑。从这个角度出发，管理人员以及管理活动被拉回研究关注的重心，成为解释管理现象的关键因素。同时，要深入理解某个管理实践，则需要考察其产生和演化机制，特别是与周围的情境和相关联的其他实践的动态关系。而在一个具体研究中，很难关注管理实践的所有方面，而通常有所侧重。为此，基于 Whittington（2006）提出的战略实践研究的三元素模型，我们提供一个研究本土管理实践的理论框架，目的在于为具体研究在界定研究问题和分析角度上提供有效的切入点。这一框架涵盖了理解管理实践的三个基本元素，而每一元素都可以成为研究和分析管理实践的切入点。

1. 实践模式：个体开展具体活动所基于的管理实践（Practices）

构成管理实践理论框架的第一个基本元素是管理实践本身，它为组织成员开展具体的实践活动提供了模板和指导。前面我们提供了管理实践的定义，即为达到特定的组织目标，具有特定模式的一系列有组织的活动的集合。管理实践是在一定程度上常规化的活动模式，从而区别

于在一个具体情境下个体所开展的实践活动（Reckwitz, 2002）。需要提出的是，组织中存在大量的为达成不同组织目标的管理实践，例如，如何进行团队协作、如何开展年度预算、如何进行战略规划、如何进行员工招聘、如何组织产品研发、如何开展精益生产、如何进行购并，等等。根据目标及其相关活动涉及的范围，这些管理实践可以体现于不同层面的管理现象中，包括个体、群体、组织层面，甚至更宏观的行业层面（如战略联盟、企业合作相关的实践）。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些管理实践可能显性地呈现于组织的章程和规定之中，如标准化操作手册，大量的管理实践却是组织成员通过日常工作所习得或发展出来的，隐性地内化于理念、习惯和文化之中。这些显性或隐性的管理实践为组织中日常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模板。这为研究管理实践提供了第一个切入点，引导研究人员关注形成模式化的管理实践，分析这些实践模式的内存逻辑，其产生和演化的机理，及其对组织活动或业绩的影响。

2. 实践活动：个体所开展的具体活动（Praxis）

理解管理实践的第二个基本元素是个体所开展的具体实践活动（Praxis）。它的内容涵盖组织成员在开展具体工作中所涉及的所有活动，包括个体或个体之间的所为（doings）和所言（sayings）。例如，在一次战略变革过程中，所有相关人员所涉及的具体活动，包括方案制定、沟通、实施等等，都是战略变革的实践活动。实践活动因其所涉及的范围可以表现于不同层面，从个体到群体，再到组织，甚至到行业层面。这些活动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例如，一次战略决策的活动可能涵盖在正式的管理团队会议中不同人员的讨论互动，以及某些人员在私下的对相关议题的探讨交涉。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这些活动的开展通常是基于一些形成常规化的实践模式。例如，在一次具体的战略变革中，管理者通常会按照一些变革模式去开展相关活动，包括如何进行分析和方案设计，如何开展沟通，如何按步骤实施，等等。然而，在介绍实践理论的核心观点时我们提到过，因为具体情境的不同，每次开展特定管理实践所呈现出来的具体活动都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从这个角度上讲，作为活动模板，特定的管理实践虽然约束着相关活动的开展，但却无法完全限制其开展的具体方式。偏离特定实践模式的活动通常是实践模式演化的重要机制之一，也是催生新生实践模式的源泉。组织成员也经常在不同实践模式进行调整组合的基础上开展其实践活动，从而有目的性的创造新的实践模式。因此，实践活动为研究管理实践提供了另一个切入点，即关注某一组织现象所包含的具体相关活动。这一方面有助于通过描述和分析相关活动的展开去解释这些复杂的现象，如战略变革（如 Denis et al., 2001）、并购过程（如 Vaara, 2003）等，另一方面有助于理解这些活动如何基于已有的实践模式进行变异和创新，从而理解实践模式的演化、创新机制。

3. 实践者：开展实践活动的个体 (Practitioners)

理解管理实践的第三个基本元素是实践者，即开展实践活动的个体。正是这些个体基于已有的实践模式开展日常的实践活动。这些个体的主观能动性（agency）体现在他们对已有实践模式的灵活运用、调整和组合，从而适应特定的管理情景和需求，以达成其目标（Reckwitz, 2002）。因此，这种能动性的发挥既基于个体本身，如他们对已经实践模式的理解和运用的能力，也是和特定情景紧密相关的。同时，因为实践活动通常涉及不同层面的不同个体，实践者包含活动参与的所有个体，而不仅仅是占据领导岗位的管理者。根据所研究的实践活动所涉及的范围，这些个体可能包括企业不同层面的人员，如高层管理者，不同级别的中层管理者，以及一线员工。例如，要研究精益化管理的实践，可能需要了解一线员工如何在其日常工作开展和实施相关的活动。而在战略管理活动中，有些研究聚焦在高层管理者（Denis et al., 2001; Ma and Seidl, forthcoming），有些研究则聚焦在中层管理者（Rouleau et al., 2015），甚至一线员工如何推动战略的实施活动（Balogun et al., 2015）。因此，实践者这一元素为研究管理实践提供了又一个切入点，即关注哪些关键个体参与实践活动，这些个体运用哪些既有的实践模式，如何灵活运用这些模式，他们面临的实际挑战是什么，如何发展其能动性去达成特定目标，以及在此过程中不同个体之间的互动。

以上三个基本元素构成了一个理解管理实践的理论框架，每个元素都为具体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研究的切入点。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组织现象中这三个元素是紧密相关的：实践者基于已有的实践模式开展实践活动，而这些活动又影响着实践模式的演化和创新；同时，对实践模式的运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实践者，改变其对已有实践模式的认知和对其灵活运用的能力。因此，深入理解任何一个元素都需要研究人员关注另外两个元素的潜在影响，虽然在具体研究很难同时聚焦三个元素而通常有所侧重（Jarzabkowski et al., 2007; Whittington, 2006）。以下我们将探讨基于这个框架如何在具体的管理实践研究中构建理论。

（三）构建理论：形成解释管理现象的理论机制

随着学界的提倡，近年来国内涌现出一些研究本土管理实践的研究。但是，很多相关研究主要是在描述管理实践和总结相关的经验，而没有更进一步地去构建解释这些实践内在机理和作用机制的理论（陈春花等，2014；叶广宇等，2012）。然而，管理研究的最终需要构建理论而非单纯地描述现象，对本土实践的研究需要实现从描述到理论的概念性飞跃（Klag and

Langley, 2012)。我们认为，基于上文中讨论的理论框架，在研究本土管理实践中可以从两个大的方向去构建理论：一是解释管理实践的相关机理，二是利用管理实践去解释其他管理现象。

1. 解释管理实践的相关机理

第一个方向是构建能够解释管理实践相关机理的理论。这些机理将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管理实践，因此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上文讨论的实践模式、实践活动和实践者为此提供了具体的切入点和角度。相关研究可以聚焦于解释某个元素从而进行相关的理论构建，从而回答上文中提到的关于每个元素的关键问题。聚焦实践模式时，关键在于呈现构成该模式的一系列活动如何有机的组合在一起来达到其目标。基于此，研究人员可以通过深入对比不同的模式去解释何种模式更为有效。Eisenhardt (1989b) 关于动态环境中战略决策的实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研究通过研究不同决策模式的不同（如对信息量的摄入以及决策方式），解释了快速决策是如何比慢速的决策过程更能够产生优异的决策结果。同时，对于重要的管理实践，解释其产生和演化的机制也同样具有重要理论意义。聚焦实践活动时，研究人员应该构建理论解释这些活动展开的具体方式（如战略变革），基于什么实践模式及如何受特定情境的影响。聚焦实践者时，研究人员需要解释在实践开展中个体能动性的发挥，其方式和影响机制是什么。例如，基于对中国四个大型国企的案例研究，Guo et al. (2017) 探索了中层管理者是如何管理区域政治环境从而实现市场目标的。他们发现了中层管理者在联接市场和政治环境中采取的两类管理实践，一是联接市场理念和政治理念体系，一是联接市场成员和政治个体。同时，他们发现，中层管理者因为所具有区域运营知识和区域关系网络，他们比高层管理者在管理区域政治环境中更具优势。而所处的管理层级让他们拥有权力和地位去管理政治环境，这是前线员工所无法做到的。Guo et al. (2017) 的理论贡献不仅是呈现中层管理者是如何管理区域政治环境的实践模式，更重要的是解释了为何中层管理者相较于其他个体更具展开这些实践的能力和资源。

2. 利用管理实践解释其他管理现象

在研究本土管理实践中进行理论构建的第二个方向是利用管理实践去解释其他管理现象。不同于上面谈到的理解管理实践本身，具体的研究也可以通过实践模式、实践活动和实践者的一个或多个维度去解释组织里的其他现象的产生和发展。这些现象可以是较微观层面的，如团队的绩效或团队决策的结果，也可能是较宏观层面的，如企业的业绩表现或独特的竞争优势（Bromiley and Rau, 2014），或者是更宏观层面的，如行业层面的并购行为或区域的竞争优势。例如，Jarzabkowski and Seidl (2008) 在研究三所大学的战略会议的实践时，通过描述这些

实践模式的不同（如讨论方式、地点选择等），解释了为何有的会议模式倾向于产生偏离现有战略方向的决策，而有的会议模式则更倾向于产生固化现有方向的决策。这样的理论构建对于理解组织战略方向的稳定性和动态性有重要价值。再例如 Balogun and Johnson（2004）在研究一个企业的战略变革中，分析了中层管理者如何通过同层级之间的协商互动实施变革方案，解释了组织成员思维模式的变化过程。这一研究是通过聚焦实践者和他们的实践活动，去解释变革的进程中人们思维模式转变的不同机制。而在更宏观的层面，Vaara et al.（2004）在研究航空业中航空公司联盟的形成时，通过分析行业中关键人员的语汇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s）及其运用，解释了航空公司联盟这一行业现象的产生和发展。目前，学者们也在倡导利用实践模式去解释企业的业绩表现和竞争优势，虽然相关的实证研究还比较少（Bromiley and Rau, 2014）。总之，将实践当作本土管理现象的解释变量进行理论构建，将有助于理解本土实践的重要影响，从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四）研究方法建议：定性与定量方法的多元和互补

在学界探讨本土研究的出路时，研究方法一直是争论的热点之一。很多学者认为，正是因为学界对于定量研究及相关统计方法严谨性的一味推崇，很大程度上导致中国管理研究与本土的管理实践脱节的现象（曹祖毅等，2015；尤树洋等，2011；徐淑英和吕力，2015；章凯等，2014）。定量研究适合于探讨变量间关系并进行相关的理论检验，而很难用于发掘新概念和构建新理论。因此，学界倡导对中国的本土管理实践进行探索性研究，采用扎根理论、案例研究、历史研究等定性研究方法（曹祖毅等，2015；尤树洋等，2011；徐淑英和吕力，2015；章凯等，2014）。在本部分，我们认为有必要针对目前本土研究的现状以及对管理实践研究的需求，提出在研究方法上的建议。一方面，目前本土研究中定性研究严谨性不足，并且缺少纵向的历时性研究；另一方面，学界对于定量研究如何可以有效地用于研究中国管理实践并未进行充分探讨。本部分试图通过对这两个方面问题的深入探讨，促进多元化方法在研究中国管理实践中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1. 提高定性研究方法在应用中的严谨性

因为对于本土管理实践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探索性的定性研究对于呈现和解释本土管理实践具有重要价值。然而，根据 Jia et al.（2012）对 1980 至 2010 间六种国际顶级管理期刊中 259 篇关于中国情境研究的文献回顾，只有一篇论文是运用扎根理论的定性研究，而且并非来自于华人学者。由此可见，对于定性方法的掌握仍然是本土研究需要克服的难题。尤其需要

注意的是，在定性研究中需要关注方法的严谨性。虽然国内近年来对定性方法的运用日趋系统化和规范化（如：刘鑫和杨东涛，2015；张笑峰等，2015；周文辉等，2016），总体上国内的定性研究在严谨性上与国际水准还存在较大差距（陈春花等，2014）。因为直接涉及到研究结论的有效性、可信性和可推广性，方法运用上的严谨性至关重要，因此是未来研究需要特别关注的。因为缺乏像定量研究中标准化的操作步骤，定性研究在方法运用上存在着巨大的挑战。目前在管理学领域定性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些广为接受的模板，如 Eisenhardt 的多案例研究方法和 Gioia 的系统化定性分析方法等，为定性研究的研究设计、数据收集、以及数据分析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指导（Langley and Abdallah, 2011）。然而，在借鉴这些模板的时候，需要避免机械的套用，而是需要根据研究问题选择和调整相应的模板。因为不同的研究问题具有不同的特性，具体的研究方法也应该存在相应的差异。因此，呈现研究方法的严谨性不仅仅在于表明自己所采用的模板，而关键在于在论文中详细阐述研究的设计、数据的来源和数量、和数据分析分别是如何有效地配合研究问题，从而让读者能够形成自己的判断。保持研究步骤的高度透明性也有助于研究人员不断反思自己研究方法的内在逻辑性，这对于没有高度标准化研究规范的定性研究至关重要。

2. 定性研究中纵向的历时性研究设计

在其关于组织理论的经典论述中，Mohr（1982）将理论划分为两类：变量理论（variance theory）和过程理论（process theory）。变量理论是通过变量之间的关系解释组织现象。例如，在研究组织变革中，变量理论会研究引起组织变革的一系列前因变量或相应的调节和情景变量。而过程理论在解释组织现象中，是通过研究一系列的活动或事件如何随时间展开并导致最终的结果。例如在前面研究组织变革的例子中，过程理论会研究变革是如何展开的，在不同的阶段有哪些相关的活动和事件，关键的转折点是什么，以及这些活动和事件如何导致最后变革的结果。和变量理论相比，过程理论强调时间维度是理解管理活动的核心要素（Langley, 1999）。根据研究的目的，定性研究既可以用于构建变量理论（如 Eisenhardt, 1989b），也可以用于构建过程理论（如 Gioia et al., 2010）。虽然在研究本土管理实践中两种理论构建的导向都具有重大价值，目前国内关于过程理论的研究仍极为欠缺。然而，时间维度是构成管理实践的核心要素，理解管理实践需要研究构成该实践的一系列相关活动如何按时间序列形成特定的模式。过程理论导向的研究对于理解本土管理实践的展开、转化、及其成效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建议未来的定性研究在研究本土管理实践当中强化对时间维度的敏感性（韩巍，2011），构建关于本土实践的过程理论。这意味着研究人员需要采用纵向历时性的研究设计，通过长时间

的观察和跟踪调研来采集数据资料，并在分析中关注活动和事件的时间序列（Langley, 1999）。

3. 如何运用定量方法研究管理实践

在倡导研究中国本土管理实践的讨论中，定性研究的价值及其紧迫性一直是讨论的热点，而对定量研究可以做出的贡献却少有讨论。事实上，只要界定好适合的研究问题和进行相应的研究设计，定量研究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能够促进对本土管理实践的理解。第一，定量研究有助于理解特定管理实践对于企业绩效的贡献（Bromiley and Rau, 2014）。这需要在研究中对于要研究的管理实践已经有深入的理解，从而设计出能够测量其在中应用程度的问卷。然后通过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对该管理实践和相应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类似地，也可以对比不同管理实践对企业绩效的贡献有何不同，从而判断在具体情境下相对更为有效的管理实践。第二，定量研究有助于理解在宏观层面特定管理实践产生和演化的条件。基于大样本的分析可以呈现管理实践的分布情况，从而有助于理解其产生和演化所需要的组织内部和外部的条件。例如，基于全国的大规模问卷调研可能会显示在特定区域会采用特定的管理实践，因此有助于探索该区域具备哪些特殊的要素，如政治、经济和区域文化环境，从而促进该管理实践的产生。类似的研究也可能显现不同区域在应用特定管理实践所处的不同阶段，从而有助于理解该管理实践演化的规律和相应的条件。第三，一些定量研究的方法和工具可以用于分析构成特定管理实践的一系列活动的内在结构。例如，在研究企业在战略沟通中的策略时，研究人员可以收集大量企业在沟通战略中使用的材料，通过计算机辅助的内容分析发掘这些企业在对新战略进行意义塑造中使用语汇、修辞的规律和逻辑。尤其是在具有大量定性数据的基础上，在合适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编码然后进行定量分析，有助于研究人员发现特定的样式和规律，从而帮助研究者进一步发掘这些样式和规律背后的理论机制（Langley, 1999）。最后，基于大样本的定量研究能够检验由探索性的定性研究所构建的关于本土管理实践的相关理论的可推广性，从而促使这些理论的修正和完善。总之，经过合理的研究设计，定量研究同样可以用于研究本土管理实践，并提供定性研究所不能产生的见解和理论，而关键是在于选取合适的定量方法和工具去实现研究的目的（Laamanen et al., 2015）。因此在研究本土管理实践中不应有所偏废，而应当鼓励不同方法的运用，从而对本土管理实践不同方面提供深入、全面和丰富的理解。

四、中国管理实践的特殊性及亟需研究的相关问题

以上基于实践理论视角讨论了研究中国管理实践的路径，并在研究方法上提供了建议。为了推动对本土管理实践的研究，有必要讨论中国管理实践的特殊性及相关亟需研究的相关问题。正如徐淑英 所倡导的，本土研究应该特别关注中国企业中那些令人费解的管理问题，那些“不同于常态的、且很难被现有文献中的逻辑和理论所解释的管理实践”（徐淑英和吕力，2015，p. 318）。基于中国企业发展的历程和现状，我们认为本土管理实践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相关的本土实践值得学者率先进行探索性研究。

（一）当下互联技术环境下的中国管理实践的领先性

在互联网技术的驱动下，现代社会已经步入了互联共享的时代。互联网技术对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带来了巨大改变，也因此对传统的组织管理和商业模式造成了巨大冲击（陈春花，2016；Davis，2015b；彭剑峰，2014）。例如，彭剑峰（2014）认为，互联网时代在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环节都颠覆着传统的实践，表现在“四个方面的‘去’：去找最聪明、最能干的人，去绩效考核；去管理层，去威权领导；去人才所有，去企业忠诚；去中心化，去边界，去利益独享”。陈春花（2016）更是认为在互联时代，管理需要新范式，因为雇员社会将要消失，而个体价值正在崛起。中国企业在融入和塑造当今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商业环境中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占据了管理实践的领先性，而不再是跟随西方的实践模式。这其中涌现一大批独具特色的新兴企业，如小米、乐视、腾讯、阿里巴巴、美团等等。中国巨大的本土市场和互联网用户为这些新兴商业实践的探索和发展提供了基础。而这些商业实践也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亟需理解本土的这些领先的管理实践，以及传统企业如何基于互联网技术进行转型和变革（谢康等，2016）。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全新的互联时代，研究这些新兴实践对管理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管理理论的一系列核心问题：例如，在高度共享的经济环境中，企业的边界到底如何界定，组织与环境是什么关系？大量基于互联共享技术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定义什么是商业模式？当基于网络技术和数据运算的平台性、开放性和协同性逐渐成为组织的新特征，传统意义上用于协调员工的组织结构到底应该如何界定，以及协调员工的管理者的工作内容发生了什么变化（Davis，2015b）？在个人价值崛起而组织忠诚度下降的情形下，个人与组织到底是什么关系？对于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没有太多既存的理论可以依靠，而需要深入地对本土新兴企业的组织形态和商业模式进行探索性研究，从他们的实践当中去发掘答案，并试图构建具有这一时代特点的管理新概念和新理论。

（二）中国管理实践产生和发展中面临着独特而复杂的本土化环境

中国管理实践在产生和发展中面临着独特而复杂的本土化环境，包括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市场环境、社会整体转型、文化传统和哲学，等等。这些本土化环境可能是西方企业所未有经历过的，因而可能催生全新的管理实践。这些特殊环境下的管理实践应当是本土研究尤为关注的。例如，不同于发达的西方国家，在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制度环境下，政府机构在企业的战略规划和公司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Keister and Zhang, 2009），而目前对这一独特管理实践的研究甚少。政府机构参与本土企业经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在经济转型时期，政府或地方政府和企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通常直接地帮助在其辖区的企业应对变化的外部环境和经营中的重大问题，而不是单纯的依靠制定宏观政策和市场规则。从这个意义上，一些学者将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划为社团主义型（corporatism）（Walder, 1995），这不同于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导向是自由市场型，从而很少直接影响企业的战略规划。另一方面，虽然经历过国企所有制改革，中国仍然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或混合所有制企业。在这些企业中，政府或相关机构会作为所有者直接参与到公司治理当中。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持有股份的企业占总体企业数量的比例极小。由此可见，在中国，政府在企业战略和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很不同于西方国家，是具有本土特色的管理实践。但由于目前的战略管理理论主要源自于西方国家，这些理论主要从企业的视角出发，集中于分析市场和技术环境对战略的影响，而很少关注政府在企业战略中的参与（Griffiths and Zammuto, 2005; Pearce et al., 2009）。因此，本土研究亟需考察政府如何参与企业战略和经营，并探讨适应本土特色的公司治理模式。基于实践理论的视角，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一系列相关的研究问题，如政府人员如何具体参与企业的战略规划（Child and Yuan, 1996）？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政府相关机构如何与其他所有者有效地互动并共同治理公司？地方政府如何帮助当地企业应对市场、技术和政治环境的变化？政府的参与模式对企业经营结果有何影响？企业与当地政府如何互动以构建其竞争优势？企业如何有效地管理对政府的依赖关系（Keister, 2004）？

本土文化环境是中国管理实践产生和发展中的另一个独特影响因素。作为本土管理实践的践行者和创造者，中国的企业家和管理者深受本土文化和思维观念的影响（席酉明和韩巍，2010）。因此，我们需要深入了解中国的企业家和管理者，包括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他们的管理哲学和认知结构，以及这些如何影响和体现在他们的管理实践当中。而主流的研究通常是探讨管理者的个人特质或领导风格和领导绩效的关系，或者利用传统的管理者角色（Mintzberg, 1973）去描述其管理活动，而较少关注他们在具体工作中实际面临的挑战，导致我们对于管理者的工作内容和管理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停留在抽象的概念层面（Korica et al., 2017）。例

如，在中国，许多管理者深受儒家、道家、法家等传统治道的影响，但学界对这些传统如何具化在他们的管理实践当中仍然知之甚少，更不用说这些实践的有效性和可复制性（Ma and Tsui, 2015）。同样，虽然我们知道中国管理者中盛行着圈子和关系的现象，对于管理者如何建立和运用圈子和关系达到特定的管理目标或为企业获得资源的实践却知之甚少（罗家德，2012）。对其面临的独特挑战及其管理实践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中国的管理者和管理模式。

（三）三十年高速增长下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创新

中国管理实践的特殊性的第三个来源是高速增长下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创新。在三十年高速经济增长的背景下，中国企业不断与国内外环境互动并进行着管理实践的创新（张毅恒等，2015），成就了许多优秀的本土企业，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有些企业甚至是全球范围内的行业先锋，它们能够领先所在的行业持续稳定地增长。这些企业的成功不再仅仅是依赖对市场、营销、技术、质量或成本等单一要素的把握，而是形成了自己卓有成效的管理模式（陈春花，2010）。特别是在中国正在进行的产业转型和升级的背景下，一些领先企业能够不断调整自身结构和战略进行持续增长，例如美的、新希望、华为、海尔等等。虽然我们对于这类企业有大量的讨论，但大多是在媒体或者报章杂志上，而对它们独特的管理实践的学术研究仍然不足（陈春花，2009）。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深入分析中国领先企业构建竞争优势并进行持续快速增长的管理实践。这需要关注它们是如何应对同行企业所共同面临的重大难题，如在高速增长的环境中如何实现探索与利用的双元平衡，如何构建和维持自身的动态竞争能力，如何实现持续的变革与调整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以及如何有效地管理利益共同体，等等。只有发掘这些领先企业在应对这些难题时所采用的异于同行的管理实践，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他们何以能够构建自身的竞争优势并保持行业领先。

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实践。尤其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企业更是掀起了全球并购的新浪潮，在国际化的速度和规模上让世人瞩目。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也呈现出一些独特的特征，例如通过在国内市场获得巨大的规模优势，获取进军海外市场的竞争优势（蓝海林等，2011），这不同于那些国内市场有限的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企业不再只是单纯地寻求更大的市场，也希望通过国际化并购重塑自身的技术优势和业务能力，从而实现战略转型。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研究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实际挑战到底是什么？这些挑战和 20 年前或 10 年前有什么不同？中国企业如何设计国际化进程的节奏（王艺霖和王益民，2016）以及不同步骤的内存逻辑？在应对一系列

的挑战中，中国企业采用的管理实践有哪些以及它们的有效性如何？在海外并购过程中如何有效地实现并购后的业务整合和文化融合？对类似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发掘中国企业国际化实践的独特性，并有机会为中国企业提供可借鉴的有效模式和路径。

以上探讨了中国管理实践的特殊性以及一些亟需研究的相关领域，以期获得未来研究的关注。然而，其它值得研究的特色的本土实践还有很多，如商帮对于企业竞争优势的构建（Keister, 2001）等，因为篇幅有限便不再一一讨论。

五、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研究的理论贡献展望

试想若干年后，如果要对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所有研究做一个理论综述，我们应该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理论体系？事实上，近年来学界对于本土管理研究在理论构建的导向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如中国管理理论、管理的中国理论、以及普适性管理理论（Barney and Zhang, 2009; Leung, 2009; 谭力文和宋晨欣, 2015; 章凯等, 2014），其实就是对本土研究应当形成何种理论体系的探讨。特别是在本土研究在理论贡献上尤为欠缺的背景下（陈春花等, 2014; Jia et al., 2012; 刘祯等, 2014），明确这一问题对于推动本土管理实践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部分将首先展望基于本土管理实践的研究可能形成的理论体系，然后探讨这样的理论体系如何贡献全球管理理论，从而明确研究本土管理实践的理论价值。

（一）基于本土管理实践研究的理论体系展望

对中国本土管理实践的广泛和深入研究必将形成一个能够理解本土实践和中国企业的理论体系，从而解决本土研究和本土实践严重脱离的问题（郭重庆, 2008; 齐善鸿等, 2010; Tsui, 2009; 徐淑英和吕力, 2015）。因为研究对象的聚焦，这样的知识体系将能够回答关于中国本土管理实践的一系列核心问题：“中国管理实践的重大问题是什么”、“中国管理实践的独特性在哪里”、以及“中国管理实践的发展脉络是什么”（陈春花, 2011: p. 5）。

1. 呈现中国管理实践是什么

基于中国本土管理实践的研究将提供一个对中国企业发展中所存在的，尤其是那些不同于西方的管理实践提供一个全面的认识。未来一系列对具体实践的深入剖析将不再只是对这些实

实践的抽象化认知（Korica et al., 2017），而是呈现其具体的内涵和相关作用机制。例如，对本文前面提出的一系列中国企业独具特色的管理实践的深入研究，将能够呈现在互联共享时代中国新兴企业在组织运作和商业模式构建中的领先实践；在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下，政府在企业战略和公司治理中的角色以及管理者在实践中所面临的挑战和对策；在高速经济增长下，中国领先企业如何构建持续的竞争优势以及本土企业国际化的实践模式。因为对管理实践本身的聚焦，相关研究还可能呈现为达到相同的组织目标，中国不同省份和区域存在的不同管理实践。这与情境化的本土研究有所不同，因为情境化的研究通常将中国文化和制度抽象成中国情境（Tsui, 2006；张静等 2016），不利于发掘中国区域之间的差异，从而无法保持对中国不同区域中管理实践的潜在差异保持敏感性。聚焦管理实践本身，将有助于发现不同实践在不同区域的分布，从而有助于发掘在中国不同区域环境中相对更为有效的管理实践。

2. 呈现中国管理实践的价值贡献性

本土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回答中国管理不同于西方管理的特色到底在哪里（郭重庆，2008；齐善鸿等，2010；Tsui, 2009；席酉明和韩巍，2010；徐淑英和吕力，2015），这个特色的理论价值贡献是什么？然而，没有对本土管理实践的深入研究，将无法进行中外管理的对比研究，无法发掘中国本土管理的特色（徐淑英和吕力，2015）。在呈现中国企业在各个方面所涉及的具体管理实践的基础上，相关研究将有机会对比本土管理实践和盛行的西方管理实践存在的差异，从而呈现中国管理实践的独特性。并且，在特殊的市场环境和社会整体转型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经历的发展环境可能是西方企业所未有经历过的，因而可能催生全新的管理实践（陈春花，2011），例如企业对区域政治环境的应对与管理（蓝海林等，2012；Guo et al., 2017），或者商帮对企业竞争优势构建的影响（Keister, 2001）。呈现中国管理实践的独特性不仅能够深化对中国管理特色的理解，还有助于将中国的管理问题国际化，从而引起国际管理学界对中国管理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3. 呈现中国管理实践的发展脉络

管理实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地经历着产生、演化、扩散、以及转化的过程。管理实践的发展是企业与周围环境不断互动的结果。中国本土管理实践的发展和演化是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特殊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对国外先进管理模式的引入和转化，以及国际市场环境密不可分的（陈春花，2011）。基于本土管理实践的系列

研究将有助于理解重要的管理实践是如何产生和演化的，和企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关系是什么，从而为梳理中国管理实践的发展脉络提供坚实的基础。

以上讨论了基于本土管理实践的研究如何有助于形成深入和全面理解中国管理实践的理论体系。然而必须提出的是，这并非是独立于全球管理知识的一个自闭体系。恰恰相反，正如下面将要探讨的，这些研究因为对本土实践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贡献全球管理知识，甚至提供全新的管理理论。

（二）基于中国本土管理实践研究对全球管理理论的贡献展望

要推动基于管理实践的本土研究必须要明确在理论发展上与全球管理知识体系的关系。目前，学界对于中国管理研究的发展方向存在着三个主要观点：中国管理理论、管理的中国理论，以及普适性理论（章凯等，2014）。中国管理理论的观点认为，本土研究应该避免另起炉灶，而是检验和拓展现有的西方理论，并通过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发掘西方理论的情境变量（Barney and Zhang, 2009）。相反地，管理的中国理论则认为文化具有独特性，而不同文化中蕴含着不同的管理规律。因此，中国管理研究应当构建基于本土语言和概念的理论体系，才能充分解释和指导本土的管理现象（Barney and Zhang, 2009）。而普适性理论的观点则认为，本土研究虽然专注于本土管理现象，但仍然应该发展普适性理论（Leung, 2009）。不同于第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现有的西方理论存在缺陷，并且存在大量理论欠缺的领域，因此本土研究应当致力于开发新的普适性理论，同时修正和完善现有的西方理论（陈春花等，2014；谭力文和宋晟欣，2015；章凯等，2014）。

我们认同构建普适性理论的观点，认为基于管理实践的本土研究将有机会为全球的管理理论做出重大贡献。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不足不仅仅是中国管理学界的独有现象，而是国际管理学界的普遍现象（Davis, 2015a）。现在国际管理学界中流行的主要理论多数产生于上世纪 60、70 年代，如结构权变理论、资源依赖理论、新制度化理论、组织种群生态理论等等，理论拓展和创新不足。在反思和展望中，回归管理现象和管理问题本身被认为是进行理论创新的关键（Davis, 2015a）。在这种背景下，贴近中国本土的管理实践不仅仅能够提高我们对本土管理现象的认知，更是中国管理研究能够贡献全球管理理论创新的历史机遇。一方面，基于实践的研究能够促使我们对现有理论基本假设的反思，从而有助于修正和拓展现有的理论。例如，Eisenhardt (1989b) 对战略决策实践的研究就发现，不同于以往决策理论的假设，快速决策相对于慢速决策通常使用更多的信息以及考虑更多的选项，从而决策的结果更优。正是对决策实

践相关活动到底如何开展的深入考察，她有机会获得这些突破性的发现，让学界对战略决策有了新的认识。另一方面，因为新理论通常源于对新的管理现象和管理实践进行解释，中国大量的创新性的管理实践为本土研究提供了理论创新的素材。例如前面提到的，基于对中国四个大型国企的案例研究，Guo et al. (2017) 探索了在中国政治经济环境下，企业是如何管理区域政治环境从而实现市场目标的。他们发现了中层管理者在这一过程中所采取的两类管理实践。Guo et al. (2017) 的研究有效地解释了中国中层管理者在管理政治环境中的实践模式。同时，因为现有的管理理论只强调了中层管理者在管理市场环境中的角色，因而不能解释他们研究中呈现的中层管理者在管理政治环境中的做法。他们的研究填补了这一理论空白，从而对中层管理理论做出了贡献。这样的理论构建，既能够有效地解释本土现象，又能够与全球管理理论提供新的见解和观点，并与之融为一体。

在中国本土管理实践的研究中采用普适性理论发展的导向，在学术语言和规范上要和管理学者保持一致，不仅能够使本土研究为全球管理知识贡献新的理论和观点，还能够推动国际学者对本土现象的关注，将中国的管理问题国际化（黄光国等，2014；Leung，2009）。因为市场和企业数量的巨大，中国管理实践因其显著性必然是国际学者关注的重点话题。而在研究中对于构建普适性理论的导向，持续和现有理论的结合和互动，有利于国际学者看到研究中国管理实践对于推动管理理论发展的价值，从而进行深入研究。尤其是新的实践常常催生新的理论，中国企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创造和采用的一些管理实践可能是在其他国家还未出现或仍不显著的。这意味着可能有许多新的管理理论会从中国的管理实践中被发掘，正如科学管理理论从美国企业实践中被发掘或精益管理在日本的企业实践中被发掘一样。当国际管理学界看到对中国本土实践的研究能够呈现具有独特性的管理现象，看到本土研究对推动一般性理论发展以及构建新理论的契机，必然会参与到相关的研究当中，从而推动对本土管理的研究（黄光国等，2014）。正如郭重庆（2008：p. 322）在谈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时所提到的，“着力研究透中国的管理问题，这就是世界的，世界必然认同，国际一流也就水到渠成”。因为对实践的深入研究要求研究者能够近距离接触这些实践并获取最鲜活的数据和资料，中国本土学者在这些独有的本土管理实践的研究中将占据天然优势。如果能够在此基础上的发掘新的理论，将让中国有机会在全球管理研究实现“弯道超车”（章凯等，2014）。

六、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研究的现实指导价值

在探索本土管理研究的走向时，学界对如何解决管理研究和本土实践脱节的现象尤为关注（齐善鸿等，2010），试图改变本土管理研究“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插不上嘴”的局面（郭重庆，2008：p. 320）。那么，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研究能否改善这一局面？对本土实践的研究如何能够创造出更具现实指导价值的理论？管理理论如何更具实用价值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Kieser et al., 2015）。对这一问题的简单认识很可能误导本土研究的发展，因而需要进行明确和探讨（陈劲和阳银娟，2012；韩巍，2011）。为此，我们将探讨基于实践的本土研究如何更具现实指导价值，及其对本土企业和管理者指导意义的具体体现。

（一）基于实践的研究因捕捉实践的逻辑而更具现实指导价值

关于管理理论的现实指导价值，学者们认为，限制管理研究实用性的根本原因是管理学者和管理实践者处在不同的社会场域，具有不同的基本假设、利益导向和场域结构（Sandberg and Tsoukas, 2011；Splitter and Seidl, 2011）。Sandberg and Tsoukas（2011）认为，主流的管理研究是基于科学理性（scientific rationality）而非实践理性（practical rationality）的。以科学理性的视角，研究者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对由客体所构成的社会现实进行观察并进行理论性的重现。科学理性包含着三个基本假设：（1）人类现实是由可分的、具有独特属性的实体所构成的。这些实体及其所具的属性是独立于观察者所客观存在的，但同时可以被认知的。

（2）学者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以主体—客体的关系为基本形式的。一边是研究者作为主体，另一边是这个世界作为被研究的客体。（3）这种认知论上的主体—客体关系被认为同样是构成实践的潜在逻辑。这样的逻辑认为，和研究者一样，实践者面临着一个由可分的实体所构成的世界，能够通过认知活动了解这些实体的独特属性，并以此认知为基础开展活动。以此为逻辑，实践者越是能够准确地认知和重现独立于其意识的外在世界，就越有可能提高其活动的有效性。基于科学理性的逻辑，实践者因为太接近于实践本身，因而对管理实践的认知是有偏差的、主观的、有偏见的，从而容易不准确和不理性。而作为旁观者，研究者通过科学方法所构建的关于管理实践的重现式知识则被认为更客观，从而更准确和更理性。因此，应用这样的科学知识可以使实践更缜密并提高其有效性。然而，Sandberg and Tsoukas（2011）认为，事实上科学理性会限制对管理实践的全面理解，主要有三个原因：（1）科学理性低估了实践者是一种整体性的方式沉浸于实践的。周围的环境和条件构成了实践者所面临的有意义的整体，而不只是一组抽象的、可相关的变量。处在一个实践之中意味着实践者面临着一个整体性的环境，其中包括具有特定影响的事件、人物、行动和选择。（2）科学理性强调不同实体的抽象特征是以何种方式在总体上是相关的，而忽视了实践者具体工作中情景的独特性。这样的逻辑容易

简化管理现象，发展出在总体水平上变量之间关系的结论，而在管理者看来过于简单而不实用。

（3）科学理性在理论发展中很少考虑实践的时间维度——个体在实践中是如何经历时间的，例如紧急性和不确定性。这一点明显表现在大量管理研究所形成的命题都是没有考虑时间维度的（例如：只表述变量 A 和变量 B 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产生效应所需的时间却很少提及）。因为这些原因，Sandberg and Tsoukas（2011）认为基于科学理性的管理研究和理论很难让管理者所接受，因而其现实意义会极其有限。

为提高管理研究的现实相关性，Sandberg and Tsoukas（2011）基于海德格尔的哲学提出了基于实践理性进行管理研究的观点。他们认为，实践的逻辑（logic of practice）可以表述为“缠绕”（entwinement），即在社会实践中我们从来都无法和其他人和事物分离，而是一直相互缠绕在一起的。这意味着某个事物之所以为某个事物，它必须是其相关整体的一个部分。除了强调个体在实践中面临周围环境的整体性，实践的逻辑还强调个体对开展实践所需知识的体身化（embodiment of practice），以及对时间的敏感性。Sandberg and Tsoukas（2011）认为要捕捉实践的逻辑就要在研究中基于实践理性而非科学理性，即研究实践到底是如何开展的以及个体是如何运用实践的。为此，他们建议在研究中注意以下步骤：（1）将实践作为研究的起点，关注实践者和相关工具的相互影响；（2）重点不只是个体，而是个体为达到特定目的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3）观察活动的开展中个体是如何运用身体以及相关的工具；（4）通过探寻实践中优秀的标准去判断到底什么对实践者是重要的；（5）通过研究这一实践与相关联的其它实践的关系去发现产生和开展这一实践的可能性。另外，研究实践中发生故障（breakdown）的情况也有利于发现实践到底是如何开展的，因为人们在产生故障时通常开始有意识地反思平时是如何开展实践的，因而让那些习以为常的隐性知识显现出来。从前文中可以得知，基于实践理性进行管理研究完全切合本文所倡导的研究管理实践的思路和方法。相对于主流的研究范式，基于实践的本土研究因为更具实践理性，将能发展出更具现实指导意义的管理知识和理论，更容易为管理者所接受，从而影响本土管理实践和管理活动的开展。

（二）基于实践的研究的指导本土实践上的具体表现

然而基于实践的本土研究是否能够如许多学者所期待的，为本土企业或管理者所面临的问题提供直接明了的解决方案？或为管理实践的提升和改善提供具体的建议和指导（齐善鸿等，2010）？在国际管理学界，当实践理论视角被应用于战略等研究领域，学者们提出了同样的问题（Splitter and Seidl, 2011；Langley, 2015）。因此，我们需要探讨基于实践的研究在指导本土实践中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虽然基于实践的管理研究重视对实践本身的研究，其目的在于

描述现实和理论构建而不是解决具体的管理问题。同时，研究者并不具备解决具体管理问题的现场知识和相关技能。因此，和大多数研究一样，基于实践的管理研究很难为管理者提供具体的问题解决方案（Astley and Zammuto, 1992; Pelz, 1978; Nicolai and Seidl, 2010）。然而，对本土实践的深入研究能够为管理者提供极具价值的概念性工具和理论框架去反思自身的实践以及面临的具体问题和处境。也就是说，基于实践的研究通过提供对管理实践的逻辑及相关活动更好的理解，影响或指导管理者的实践活动（Splitter and Seidl, 2015）。

我们认为，基于实践的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现实指导价值可以表现在三个主要方面：首先，对本土实践的深入研究通过呈现不同的管理实践在不同情境中的运用，可以让管理者对自身管理活动进行反思，并意识到新的或不同的管理实践的存在，从而开拓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管理者通常沉浸在管理活动当中，而对自己习以为常的管理方式和活动很难进行真正的反思。通过对管理实践及其相关活动的描述和相关作用机制的解释，研究者可以为管理者呈现采取不同实践和不同行动的多种可能性，以及这些可能性存在的优势和局限。其次，基于实践的本土研究可以为管理者呈现他们在管理实践中可能忽视的因果关系、作用机制和负向效应。对于个体在实践中所面临多种因素的整体性关注，使相关研究能够更全面地呈现实践的复杂性和多种不同的作用机制。如果意识到这些复杂性和作用机制，将有助于管理者更好地理解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和处境。再次，基于实践的本土研究能够为管理者提供新的语汇或概念，使他们能够以一种新的视角去看待相关的实践，从而采用新的方式去灵活运用这些管理实践，从而发挥其在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因为是基于本土实践的研究所构建出来，这些新的语汇或概念更有可能为本土管理者所接受，从而在他们的实践中运用这些语汇或概念去思考、探讨和解决相关问题。

七、结束语

经历了 30 多年的发展并引入大量西方的管理理论之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正处在一个历史转折点：本土研究应该如何进一步向前发展、如何能够构建新的理论而不仅仅是检验西方理论、如何能够贴近并解释中国本土管理实践而不是和实践相脱节，以及如何使本土研究对本土管理实践产生影响是学界近年来探讨的热点话题。虽然关注中国本土的管理实践并构建能够有效解释和指导本土实践的理论已经成为学者们的共识，真正践行这一理念的研究仍然非常有限。其原因主要在于学界没有在实际路径上达成一致的看法，尤其是对管理实践的定义、分析框架、关键问题的界定、以及理论贡献等方面缺乏清晰一致的认识。为解决在实际路径上的疑惑，本文介绍了实践理论的视角，及其应用于战略管理从而推动对战略实践研究的经验，从而讨论其

对本土实践研究的借鉴意义。基于这一视角，本文探讨了研究本土管理实践的一个可行性路径，包括对管理实践的定义和对其分析的理论框架。为了推动对本土重要实践问题进行研究，本文讨论了中国管理实践的特殊性及亟需研究的相关问题，包括中国管理实践在当下互联技术环境下的实践领先性，中国管理实践产生和发展中面临着独特而复杂的本土化环境，以及三十年高速增长下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创新。最后，本文对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研究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指导价值进行了展望和深入探讨。总之，通过对研究中国本土管理实践在实现路径上一系列关键问题的探讨，我们希望能够推动对本土实践的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使本土研究不仅仅能够更好地描述和解释中国管理实践，更能够通过构建新理论贡献于全球管理理论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Astley, W.G. and R.F. Zammuto, 1992, "Organization science, managers, and language games",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 3, pp. 443~460.
- [2] Balogun, J. and G. Johnson, 2004,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 and middle manager sensemak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 47, pp. 523~549.
- [3] Balogun, J., K. Best, and J. Le, 2015, "Selling the object of strategy: How frontline workers realize strategy through their daily work", *Organization Studies* Vol. 36, pp. 1285~1313.
- [4] Barney, J. B., and S. Zhang, 2009, "The future of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A theory of Chinese management versus a Chinese theory of management",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Vol. 5, pp. 15~28.
- [5] Bloom, N. and J. Van Reenen, 2010, "Why do management practices differ across firms and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4, pp. 203~24.
- [6] Bourdieu, P.,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Cambridge: Polity.
- [7] Bromiley, P. and D. Rau, 2014, "Towards a practice-based view of strateg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35, pp. 1249~1256.
- [8] 曹祖毅、伊真真、谭力文, 《回顾与展望: 直面中国管理实践——基于“中国·实践·管理”论坛的探讨》, 《管理学报》, 2015 年第 3 期。
- [9] 陈春花, 《中国领先企业的管理方式研究——中国理念—西方标准》,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 2009 年第 4 期。
- [10] 陈春花, 《当前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管理研究》, 《管理学报》, 2010 年第 9 期。
- [11] 陈春花, 《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研究的内涵认知》, 《管理学报》, 2011 年第 1 期。
- [12] 陈春花、宋一晓、曹洲涛,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管理学报》, 2014 年第 3 期。
- [13] 陈春花, 《共享时代的到来需要管理新范式》, 《管理学报》, 2016 年第 2 期。
- [14] 陈劲、阳银娟, 《管理的本质以及管理研究的评价》, 《管理学报》, 2012 年第 2 期。
- [15] Child, J., and L. Yuan, 1996,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on economic reform: The case of investment decisions in China",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 7, pp. 60~77.
- [16] Davis, G.F., 2015a, "Celebrating organization theory: The after-party",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Vol. 52, pp. 309~319.
- [17] Davis, G.F., 2015b, "Editorial essay: What is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for?"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 60: pp. 179~188.
- [18] Denis, J.L., L. Lamothe, and A. Langley, 2001, "The dynamics of collective leadership and strategic change in pluralistic organiz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 44, pp. 809~837.

- [19] Eisenhardt, K.M., 1989a, “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study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14, pp. 532~550.
- [20] Eisenhardt, K.M., 1989b, “Making fast strategic decisions in high-velocity environment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 32, pp. 543~576.
- [21] Feldman, M.S. and W.J. Orlikowski, 2011, “Theorizing practice and practicing theory”,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 22, pp. 1240~1253.
- [22] Foucault, M.,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1977,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23] Giddens, A.,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1984, Cambridge: Polity.
- [24] Gioia, D.A. and K. Chittipeddi, 1991, “Sensemaking and sensegiving in strategic change initi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12, pp. 433~448.
- [25] Gioia, D.A., K.N. Price, A.L. Hamilton and J.B. Thomas, 2010, “Forging an identity: An insider-outsider study of processes involved in the formation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 55, pp. 1~46.
- [26] Golsorkhi, D., Rouleau L., Seidl D., and E. Vaara, 2010. *Cambridge Handbook of Strategy as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27] Golsorkhi, D., Rouleau L., Seidl D., and E. Vaara, 2015, “Introduction: what is strategy as practice?”, in *Cambridge Handbook of Strategy as Practice*, D. Golsorkhi, et al., Editors. 201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p. 1~29.
- [28] Griffiths, A. and R.F. Zammuto, 2005,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systems and variations in 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30, 823~842.
- [29] Guo, Y., Q.N. Huy, and Z. Xiao, 2017, “How middle managers manage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to achieve market goals: Insights from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38, pp. 676~696.
- [30] 郭重庆, 《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管理学报》, 2008 年第 3 期。
- [31] 韩巍, 《管理研究认识论的探索: 基于“管理学在中国”专题论文的梳理及反思》, 《管理学报》, 2011 年第 12 期。
- [32] Hendry, J. and D. Seidl, 2003, “The struc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strategic episodes: Social systems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of strategic chang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Vol. 40, pp. 175~195.
- [33] 黄光国、罗家德、吕力,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对黄光国、罗家德的访谈》, 《管理学报》, 2014 年第 10 期。

- [34] Huy, Q.N., K.G. Corley, and M.S. Kraatz, 2014, “From support to mutiny: Shifting legitimacy judgments and emotional reactions impac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radical chang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 57, pp. 1650~1680.
- [35] Jarzabkowski, P., 2008, “Shaping strategy as a structuration proces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 51, pp. 621~650.
- [36] Jarzabkowski, P., 2003, “Strategic practices: An activity theory perspective on continuity and chang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Vol. 40, pp. 23~55.
- [37] Jarzabkowski, P., J. Balogun, and D. Seidl, 2007, “Strategizing: The challenges of a practice perspective”, *Human Relations*, Vol. 60, pp. 5~27.
- [38] Jarzabkowski, P., S. Kaplan, D. Seidl, and R. Whittington, 2016, “On the risk of studying practices in isolation: Linking what, who, and how in strategy research”, *Strategic Organization*, Vol. 14, pp. 248~259.
- [39] Jarzabkowski, P. and D. Seidl, 2008, “The role of meetings in the social practice of strategy”, *Organization Studies*, Vol. 29, pp. 1391~1426.
- [40] Jarzabkowski, P. and A.P. Spee, 2009, “Strategy-as-practice: A review and future directions for the fiel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Vol. 11, pp. 69~95.
- [41] Jia L., S. You, and Y. Du, 2012 “Chinese context and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search: A three decade review”,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Vol. 8, pp. 173~209.
- [42] Johnson G., A. Langley, L. Melin, and R. Whittington, 2007, *Strategy as practice: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resour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43] Kaplan, S., “Framing contests: Strategy making under uncertainty”, 2008,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 19, pp. 729~752.
- [44] Kaplan, S. and W.J. Orlikowski, 2013, “Temporal work in strategy making”,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 24, pp. 965~995.
- [45] Keister, L.A., 2004, “Capital structure in transi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financial strategies in China's emerging economy”,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 15, pp. 145~158.
- [46] Keister, L.A., 2001, “Exchange structures in transition: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lending and trade relations in Chinese business group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6, pp. 336~360.
- [47] Keister, L.A. and Y.L. Zhang, 2009, “Organizations and management in China”,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Vol. 3, pp. 377~420.

- [48] Kieser, A., A. Nicolai, and D. Seidl, 2015, “The practical relevance of management research: Turning the debate on relevance into a rigorous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Vol. 9, pp. 143~233.
- [49] Klag, M. and A. Langley, 2012, “Approaching the conceptual leap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Vol. 15, pp. 149~166.
- [50] Korica, M., D. Nicolini, and B. Johnson, 2017, “In search of ‘managerial work’: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an analytical categ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Vol. 19, 151~174.
- [51] Laamanen, T., Reuter, E., Schimmer, M., Ueberbacher, F. and X. Welch Guerra, 2015,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strategy-as-practice research”, in *Cambridge Handbook of Strategy as Practice*, D. Golsorkhi, et al., Edito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p. 520~543.
- [52] 蓝海林、宋铁波、曾萍, 《情境理论化: 基于中国企业战略管理实践的探讨》, 《管理学报》, 2012 年第 1 期。
- [53] 蓝海林、李铁瑛、黄嫚丽, 《中国经济改革的下一个目标: 做强企业与统一市场》, 《经济学家》, 2011 年第 1 期。
- [54] Langley, A. and C. Abdallah, 2011, “Templates and turns in qualitative studies of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in *Building methodological bridges: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D. Bergh and D. Ketchen, Editors, Emerald Group: Bingley, UK. pp. 201~235.
- [55] Langley, A., 1999, “Strategies for theorizing from process data”,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24, pp. 691~710.
- [56] Langley, A., 2015, “The ongoing challenge of developing cumulative knowledge about strategy as practice”, in *Cambridge Handbook of Strategy as Practice*, D. Golsorkhi, et al., Edito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p. 111~127.
- [57] Leung, K., 2009,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 Integra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management research.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Vol. 5, pp. 121~129.
- [58] Liu, F. and S. Maitlis, 2014, “Emotional dynamics and strategizing processes: A study of strategic conversations in top team meeting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Vol. 51, pp. 202~234.
- [59] 刘鑫、杨东涛, 《企业价值观管理体系的构建及其作用机制——基于 A.O.史密斯公司的案例研究》, 《管理学报》, 2015 年第 9 期。
- [60] 刘祯、陈春花、徐梅鑫, 《和而不同: 管理学者争鸣与反思的价值贡献》, 2014 年第 9 期。
- [61] 罗家德, 《关系与圈子——中国人工作场域中的圈子现象》, 《管理学报》, 2012 年第 2 期。

- [62] Ma, L. and A.S. Tsui, 2015,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ies and contemporary leadership",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Vol. 26, pp. 13~24.
- [63] Ma, S. and D. Seidl, forthcoming, "New CEOs and their collaborators: Divergence and convergence between the strategic leadership constellation and the top management team",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 [64] Maitlis, S., 2004, "Taking it from the top: How CEOs influence (and fail to influence) their boards", *Organization Studies*, Vol. 25, pp. 1275~1311.
- [65] Mantere, S., H.A. Schildt, and J.A.A. Sillince, 2012, "Reversal of strategic chang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 55, pp. 172~196.
- [66] Mintzberg, H., 1973, *The nature of managerial work*, New York: Harper & Row.
- [67] Mohr, L.B., 1982, *Explaining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 [68] Nicolai, A. and D. Seidl, 2010, "That's relevant! Different forms of practical relevance in management science", *Organization Studies*, Vol. 31, pp. 1257~1285.
- [69] Nicolini, D., 2012, *Practice theory, work, and organization: An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70] Ortner, S. B., 2006, *Anthropology and Social Theory: Culture, Power and the Acting Subject*,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71] Paroutis, S. and L. Heracleous, 2013, "Discourse revisited: Dimensions and employment of first-order strategy discourse during institutional adop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34, pp. 935~956.
- [72] Pearce, J.L., R. Dibble, and K. Klein, 2009,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s on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Vol. 3, pp. 503~541.
- [73] Pelz, D. C., 1978, "Some expanded perspectives on use of social science in public policy", in Yinger, M. J., and Cutler, S. J. (eds.), *Major Social Issues: A Multidisciplinary View*, New York: Free Press: pp. 346~357.
- [74] 彭剑锋, 《互联网时代的人力资源管理新思维》,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4 年第 12 期。
- [75] 齐善鸿、白长虹、陈春花、陈劲、程新生、韩德强、焦媛媛、李德昌、李季、李莉、李新建、林润辉、刘广灵、刘云柏、罗纪宁、罗永泰、彭贺、齐岳、申光龙、沈超红、石鉴、孙继伟、王芳、王学秀、吴晓云、武立东、武亚军、邢宝学、许晖、薛有志、严建援、杨坤、于斌、袁庆宏、张永强、周建、周建波、周晓苏, 《出路与展望: 直面中国管理实践》, 《管理学报》, 2010 年第 11 期。
- [76] Reckwitz, A., 2002, "Toward a theory of social practices: A development in culturalist theorizing",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Vol. 5, pp. 243~263.

- [77] Rouleau, L., J. Balogun, and S.W. Floyd, 2015, "Strategy-as-practice research on middle managers' strategy work", in *Cambridge Handbook of Strategy as Practice*, D. Golsorkhi, et al., Edito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p. 598~615.
- [78] Sandberg, J. and H. Tsoukas, 2011, "Grasping the logic of practice: Theorizing through practical rational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36, pp. 338~360.
- [79] Schatzki, T. R. 2006, "On Organizations as they Happen", *Organization Studies*, Vol. 27, pp. 1863~1873.
- [80] Schatzki, T.R., K. Knorr-Cetina, and E.v. Savigny, 2001, *The practice turn in contemporary theory*, Routledge: London.
- [81] Splitter, V. and D. Seidl, 2011, "Does practice- based research on strategy lead to practically relevant knowledge? Implications of a Bourdieusia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Vol. 47, pp. 98~120.
- [82] Splitter, V. and D. Seidl, 2015, "Practical relevance of practice-based research on strategy", in *Cambridge Handbook of Strategy as Practice*, D. Golsorkhi, et al., Edito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p. 128~141.
- [83] 谭力文、宋晟欣, 《管理学本土化问题研究的分析与再思考》, 《管理学报》, 2015 年第 7 期。
- [84] Tsui, A.S., 2006, "Contextualization in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Vol. 2, pp. 1~13.
- [85] Tsui, A.S., 2009, "Editor's Introduction - Autonomy of inquiry: Shaping the future of emerging scientific communitie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Vol. 5, pp. 1~14.
- [86] 王艺霖、王益民, 《高层管理人员权力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节奏研究》, 《管理学报》, 2016 年第 3 期。
- [87] Walder, A.G., 1995,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1, pp. 263~301.
- [88] Whittington, R., 2006, "Completing the practice turn in strategy research", *Organization Studies*, Vol. 27, pp. 613~634.
- [89] Wittgenstein, L., 1953,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Oxford: Blackwell.
- [90] Vaara, E., 2003, "Post-acquisition integration as sensemaking: Glimpses of ambiguity, confusion, hypocrisy, and politiciz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Vol. 40, pp. 859~894.
- [91] Vaara, E., B. Kleyman, and H. Seristo., 2004, "Strategies as discursive constructions: The case of airline allianc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Vol. 41, pp. 1~35.
- [92] Vaara, E. and R. Whittington, 2012, "Strategy-as-Practice: Taking social practices seriously",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Vol. 6, pp. 285~336.

- [93] Vygotsky, L., 1978,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94] 席酉民、韩巍,《中国管理学界的困境和出路:本土化领导研究思考的启示》,《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2 期。
- [95] 谢康、吴瑶、肖静华、廖雪华,《组织变革中的战略风险控制——基于企业互联网转型的多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16 年第 2 期。
- [96] 徐淑英、吕力,《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对徐淑英的访谈》,《管理学报》,2015 年第 12 卷第 3 期。
- [97] 叶广宇、黄嫚丽、王永健,《实践导向的管理理论研究:内涵、机制与成果评价——2011“中国·实践·管理”论坛观点述评》,《管理学报》,2012 年第 2 期。
- [98] 尤树洋、贾良定、蔡亚华,《中国管理与组织研究 30 年:论文作者、风格与主题的分布及其演变》,《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4 期。
- [99] 张静、罗文豪、宋继文、黄丹英,《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的演进与展望——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的发展范例与社群构建》,《管理学报》,2016 年第 7 期。
- [100] 张笑峰、席酉民、张晓军,《本土领导者在应对不确定性中的作用——基于王石案例的扎根分析》,《管理学报》,2015 年第 2 期。
- [101] 张毅恒、曹祖毅、伊真真,《经济转型中的管理理论创新——2015'中国本土管理研究论坛(第 2 届述评)》,《管理学报》,2015 年第 10 期。
- [102] 章凯、张庆红、罗文豪,《选择中国管理研究发展道路的几个问题——以组织行为学为例》,《管理学报》,2014 年第 10 期。
- [103] 周文辉、林华、陈晓红,《价值共创视角下的创新瓶颈突破案例研究》,《管理学报》,2016 年第 6 期。